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研究

韩广强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走向成熟与系统化的关键阶段。面对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严重干扰,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及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构建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场域,深入剖析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理论渊源、形成轨迹、核心内涵及实践路径,揭示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实事求是方法论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更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 抗日战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走向成熟与系统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革命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严重阻碍着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在延安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考与革命实践,将实事求是提升为系统的思想方法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结合。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更对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将从形成背景、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实践路径及历史地位五个维度,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

一、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形成背景

(一) 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严重干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民族危亡的现实要求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党内思想的不统一严重制约着正确路线的贯彻实施。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

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否认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方针，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决策。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尽管遵义会议已经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但党内的思想路线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依然在党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批判的：“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2]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僵死的教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主义者则局限于局部经验，缺乏理论自觉。两种错误思想共同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实践需求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党的中心任务由土地革命转向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转变要求党必须制定符合抗日实际需要的方针政策：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如何把握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必须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环境下进行的，具有中国独特的战争特点和一般性战争特点。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革命的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能盲目照搬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3]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实践要求。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现实推动

为解决党内思想不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核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中心内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这是对实事求是方法论最经典的表述。

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刻反思历史上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教训，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根基

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方法的哲学基础。

《实践论》突出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指出：“认识始于实践，实践忠于认识，通过实践获得理论知识，必须回归实践，为实践服务。”^[5]这一观点深刻阐

明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这一认识论原理构成了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哲学前提——只有深入实践，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

《矛盾论》则从辩证法角度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强调，要从联系、发展和完整的角度看待事物，从事物本身及其外部世界关系出发，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发现其内在本质和变化规律。^[6]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正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辩证逻辑。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

实事求是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达，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系统梳理了实事求是的文化渊源，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实践。

“实事求是”一语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评价河间献王刘德。这一命题从考据学范畴逐渐演变为认识论范畴。宋明理学家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强调通过探究事物获得真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清乾嘉学派倡导“朴学”精神，强调务实求真，反对空谈义理。^[7]

毛泽东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他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8]将实事求是提升到党性高度，实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

（三）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形成，也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惨痛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强调研究战争规律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指出：“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0]这一论述将实事求是方法论具体运用于战争规律的研究，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

三、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基本内涵

（一）“实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

“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强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意识来源于物质，认识来源于客观实际，要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1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正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战争性质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必然失败；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赢得人民的支持，最终取得胜利。这一科学分析为持久抗战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

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2]的著名论断，强调必须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亲自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从农村阶级状况到根据地建设，从敌后斗争到统一战线工作，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二）“是”：探索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

“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与规律性，这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核心目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系统研究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他指出：“中国战争的持久性，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13]这一论断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基于对中日双方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日本是小国，人力物力有限，经不起长期消耗；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同时，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国际支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国际孤立。

探索规律还必须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失，必须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4]

（三）“求”：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求”即去研究，是连接“实事”与“是”的桥梁，也是将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实践行动的关键环节。毛泽东强调，认识的真理性和否符合客观规律要靠实践才能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才能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15]

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战略的正确性正是在战争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到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每一次胜利都证明了持久战战略的科学性。同时，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总结抗战经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战略战术，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实践检验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而是经过无数次的检验，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深入，人们才能不断地接近最终真理。”^[16]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发展性特征。

四、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实践路径

（一）彻底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实事求是方法论在党内思想建设中的集中体现。面对党内思想不统一的严重局面，毛泽东认识到，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顺利开展，抗日战争就不能团结一致取得最终胜利。^[17]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入手，要求全体党员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献，深刻反思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毛泽东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使全党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学风。

整风运动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18]通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错误思想得到清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

（二）制定了科学的抗战方针

实事求是方法论在抗日战争战略决策中的运用，集中体现为《论持久战》的发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19]

持久战战略的制定，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揭示出战争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20]这一科学预见为全党全军指明了奋斗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三）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实事求是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系统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问题，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为实事求是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矛盾论》系统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深入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等问题。毛泽东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2]矛盾分析法成为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核心内容。

五、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飞跃

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确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飞跃。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话语、中国气派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科学理论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壤。

实事求是方法论打破了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毛泽东批评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3]。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

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正式形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系统阐释，将其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他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24]

延安整风后，实事求是成为全党共识，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事求是始终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5]

（三）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双重挑战。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科学分析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制定正确方针政策。^[26]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27]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这一基本国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方法论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和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毛泽东立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底蕴，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和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构建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实事求是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现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科学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25.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18.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71.
-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01.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83-285.
-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99-306.
- [7] 王兴国. 实事求是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141-176.
-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95.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5.
-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71.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01.
-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9.
-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42.
-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49-752.
-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84.
-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85.
-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12-814.
-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06.

-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0.
-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2-467.
-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9.
-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5.
-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0-153.
- [2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74.

A Study on Mao Zedong's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n Guang qia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was a critical stage in the matu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Mao Zedong's pragmatic thought. Facing severe interference from dogmatism and empiricism within the Party, Mao Zedong, based on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the China revolution,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centered on pragmatism through philosophical works such as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as well as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ak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formation trajectory, core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Mao Zedong's pragmatic methodology, revealing its pivotal role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pragmatic methodology not only provided a scientific ideological weap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also laid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deological line, offering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Mao Zedo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ethodolog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